

理解和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因素

【摘要】语言与文化互相关联,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因此不同的语言反映着不同的文化。译者所从事的不仅是语言上的转换,更应是文化信息的传递。译者应分析词语概念意义与社会文化意义的相同性及相异性,理解和处理好翻译中的文化因素。

【关键词】翻译;文化因素;社会文化意义

文化是语言赖以生存的土壤,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文化依靠语言得以交流、传播、延续和发展。语言文字中,处处都有文化的烙印;它以语言为形式,以文化为内容,以文化的交流和沟通为目的。因此,翻译过程中文化因素的理解与处理便成为十分重要的课题。

1 文化因素的重要性

翻译家尤金奈达指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由于各个国家、民族的社会制度、自然环境、宗教信仰、民俗风情、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习惯因素所寄托的语言系统发生了时空环境的变化,其文化附加意义也将随之发生变化甚至消失。

翻译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我国学者王佐良先生曾说过:“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在一种文化里有一些不言而喻的东西,在另外一种文化里却要费很大的力气加以解释”。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一定的语言代表和反映一定的社会文化。因此不同的民俗和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是造成机械性直译或死译的客观因素。翻译难,难就难在文化背景知识的理解与翻译上。一般说来,一种语言中的纯语言障碍可以较容易地在另一种语言中得到克服,但要克服文化上的差异并在语言上反映则比较困难。由于翻译涉及两种文化中的交际,而文化又关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对于从事翻译的人来说,探讨语言的文化价值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王克非先生说:“文化既是人类创造的价值,又具有民族、地域、时代特征,因此不同文化需要沟通。这种沟通离不开翻译,因为语言文字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可见,文化及其交流是翻译发生的根源,翻译是文化交流的产物。”当代英国译学理论家苏珊·巴思内特(Susan Bassnett)曾把语言比喻为文化有机体中的心脏。她说:“如同在做心脏手术时,人们不能忽略心脏以外的身体其他部分一样,我们在翻译时也不能冒险将翻译的内容和文化分开来处理”。语言翻译不仅是语符表层指标意义的转换,更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互沟通和移植。翻译活动既涉及两种语言,更涉及两种文化。

2 对翻译活动中文化因素的理解

2.1 文化的定义与分类

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威雨村先生在《语言、文化、对比》一文中说:“广义文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文化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文化可分为三个层次:(1)物质文化:建筑物、服饰、工具、食品;(2)制度习俗文化包括制度、法规和风俗习惯;(3)精神文化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也包括哲学、科学、文艺方面的成就和作品。

2.2 跨文化交流中民族文化的内涵

世界上各国、各民族的历史发展、地理位置、社会制度、生态环境、民情风俗与宗教信仰各不相同,由此形成的民族文化的內容与形式必须具有民族性特点。在跨文化交流中,一种具有独特民族内涵的词语在译入语中不存在相等或对应词语来表达其含义,形成文化交流的“断裂带”,出现翻译界所称“词语空缺”。

2.3 语言的社会文化意义

在语言中,词语是最积极、最活跃的一个部分:社会生活、民族文化的发展无不在词语中得到直接反映。语言的文化载储功能首先也是通过词汇显示出来的。而语言的文化意义最集中、最明显地体现在词汇的意义——词义上。英国著名语言学家杰弗里·利奇(Geoffrey Leech) 1974年出版的《语义学》(Semantics)是一部颇具影响的著作。他把词义分为七大类型:①概念意义(conceptual meaning);②内涵意义(connotative meaning);③社会意义(social meaning);④情感意义(affective meaning);⑤反馈意义(reflected meaning);⑥搭配意义(collocative meaning);⑦主题意义(thematic meaning)。利奇认为:“反馈意义、搭配意义、情感意义和社会意义这四种意义与内涵意义之间比它们与概念意义之间具有更多共同之处;它们都具有同样的不限定、可变化的特性,并且都能作程度和范围的分析。这五种意义都能用联想意义这一名称来概括”。这五种意义便是社会语言学中所说的“非理性意义”,也就是被传统语义学所忽视的语言的非指称意义(non-referential meaning),由于它们从广义上显示了语言的社会文化特征,有的语言学家称之为“社会文化意义”或“文化伴随意义”。翻译家奈达曾说过,翻译即译意;同时他有一个著名的命题:“翻译就是交际”。在翻译交际中,尽管概念意义是信息赖以传达的基础,但由相关思维所产生的联想意义却是语言交际的核心因素,译者常需通过类比联想的方法翻译其社会文化意义,才能有效传达原语的语用涵义以达到有效交际的目的。而具有这类社会文化意义的词语往往构成翻译的主要障碍。这样的词语虽能在对应的语言中找到概念相同的词语,却可能出现文化含义的不对应或假对应,从而造成理解上的偏差或表达失误。

3 对翻译活动文化因素的处理

翻译中文化的载体改变了,文化环境就不复存在了。所以,翻译时应对原文文字中的文化含义敏锐觉察,对原文所蕴涵的文化背景在译文中适当补充,澄清在异族文化中容易误解的概念,帮助译文受众跨越文化障碍。汉英民族不同文化所导致的文化意义的差异主要表现在:

3.1 概念意义和社会文化意义基本相同

这类词语可采用直译的方法,将原文概念、文化意义和形象及寓意同时传达到译文当中,例如:趁热打铁 — to 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 混水摸鱼 — to fish in troubled water 丢脸 — to lose face, face losing

3.2 概念意义相同,文化意义不同

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中,同一事物可伴有不同的联想意义,其对应的词汇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翻译中如果不了解其文化意义,也就不可能了解其深层语义,就容易犯文化错误。例如:龙(高贵) — drag on (凶恶) 农民(忠厚朴实) — peasant (心胸狭窄) 蓝(蓝色) — blue (忧郁、淫秽)这类具有不同文化意义的词语在一方文化中可能是褒义词或中性词,而在另一方文化中可能是贬义,这时就不能简单地照字面的意义直译了。

3.3 概念意义对应,文化意义空缺

英美留学生论文专家 世界一流的师资力量 10多年的服务经验

原文的词语在译入语中有概念意义的对应词,但没有原文的文化意义,常见于比喻性词语。例如:“胸有成竹”若译成英文的“He has long had full-grown bamboo in his bos om”那将是一个典型的文化错误,这时词语的概念意义仅为手段,比喻意义才是目的,翻译时若找不到表达相同喻义的词语,就只能采取意译的办法(He has long had a well-thought-out plan in his plan)或借用英语的喻体。

3.4 概念意义相同,文化意义有同有异

英汉语中某些词汇的文化意义有同有异,这既反应了英汉民族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及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共同性,也说明了英汉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例如猫头鹰(owl)在英汉两种文化中均是不吉利的象征,但在英语中也有聪明的意思,如“as wise as owl.”

4 翻译的可译性限度

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一定地域内国家的人群进行物质生产、社会活动的独特反映。各地域的人由于地理环境、文明程度、宗教信仰和民族风俗等的不同,因而形成社会方式和民族文化的差异,这些差异又往往成为翻译的障碍,不同程度地限制了语言转换过程中原文信息被有效传达的程度,即翻译的可译性限度。总之,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翻译与文化紧密相连。离开了文化,跨文化交流就失去了内容,翻译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更是两种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移植;翻译不仅要研究语言,更要研究语言所依存的文化,理解和处理好翻译中的文化因素,才能达到奈达所称的“真正成功的翻译”的理想目标。

【参考文献】

- [1] Bassnett S, Lefevere A. Constructing Cultures.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2] Bassnett S.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94.
- [3] Hoey M. Patterns of lexis in Text.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4] Kramsch C. Language and Culture.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
- [5] Leech G. Semantics,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LTD, 1978.
- [6] Newmark P.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7] Nida EA.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United Bible Societies, 1982.
- [8] Nord C.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9] Scollon 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Oxford: Blackwell, 1995.
- [10] Wilss W.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11] 陈安定.英汉比较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8.
- [12] 陈忠诚.词语翻译丛谈[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9.

- [13] 方梦之.翻译新论与实践[M].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
- [14] 冯庆华.实用翻译教程[M].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
- [15] 耿龙明.翻译论丛[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 [16] 胡文仲.文化与交际[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 [17] 李瑞华.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 [18] 梁镛.跨文化的外语教学与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 [19] 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 [20] 陆国强.现代英语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 [21] [美]尤金·奈达.语言、文化与翻译[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3.
- [22] 谭载喜.奈达论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 [23] 王秉庆.文化翻译学[M].南京: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 [24] 王治奎.大学汉英翻译教程[M].青岛: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
- [25] 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 [26] 吴友富.国俗语义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 [27] 杨自俭,刘学云.翻译新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
- [28] 周玮.旅游英语应用文[M].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0.

51lunwen.org